

程平山 著

夏

商

周

历史与考古

人
民
出
版
社



K220.7

4

夏
商
周

程平山 著

历史与考古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商周历史与考古/程平山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

ISBN 7-01-004994-7

I. 夏… II. 程… III. ①中国-古代史-三代时期-文集 ②文物-考古-中国-三代时期-文集 IV. ①K220.7-53 ②K87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7606 号

夏商周历史与考古

XIASHANGZHOU LISHI YU KAOGU

程平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455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01-004994-7 定价:36.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本书收录了作者在过去十多年间的研究文章十五篇,按照课题而言包括了对于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研究。

作者对于夏代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始于十余年前思考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和二里头遗址的性质。直到数年前研究夏代纪年时,终于对夏代历史与文化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夏代纪年的研究不仅是探索夏代历史与文化的基石,而且纪年、都邑和文化是一体的。《夏代纪年考》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夏代纪年的研究是大体可靠的,前人的疑问大体得以解决;并且对于早期夏文化和二里头遗址的性质提出了基于夏代纪年的看法。作者关于夏代纪年、都邑和文化的研究的主要观点是:1. 夏年 432 和 471 年只是计算方法的差别,二者都是可靠的。2. 夏人的祀典以大禹为开国之君,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末期文化和二里头一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二里头二至四期文化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文化。3. 二里头遗址是少康中兴以后夏代中晚期诸王的都邑。

先秦文献有“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之语,但是八迁所指失载。自汉唐以来,学者就致力于考证契至汤时期商人的八次迁徙以及具体的地望。先商历史地理与文化的研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走上考古学与历史文献相结合之路,李景聃在豫东商邱进行勘探与发掘,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型遗址,并且对于传说的古迹进行识别。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学者也有调查与发掘。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张光直教授促成中美联合考古,在河南商丘地区寻找商汤亳都。经过努力,取得一些资料,但是与寻找商汤亳都和先商文化的目标尚有相当的距离。先商文化的探索之难超出了张氏的想象,他得出二里岗文化由岳石文化发展而来的结论。一些学者提出漳河型文化等是先商文化。以上情况表明学者关于先商历史地理、考古学文化、文化变迁的研究尚未达到清楚的认识。

先商暨商代历史地理与文化是作者长期的研究课题。1994 年秋,作者撰写《郑州商城性质初探》,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1. 漳河型文化、辉卫型文化和南关外型文化不是先商文化。2. 东方之亳、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商汤的“三亳”,东方之亳为商汤灭夏以前的亳都,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商汤灭夏以后营建的都城。其后十年分门别类地研究获得了十四篇文章。这里选择了其中的十篇,主要是探索先商暨商代历史地理与文化。前五篇研究历史地理,其后四篇探索先商文化,最后一篇是前九篇考论的总结和思考。历史地理方面主要是考证了契至汤八迁、鬲伯相土所居商丘、商汤居亳、商汤“三亳”和商周管邑,先商文化探索方面主要论证了漳河型文化、探索先商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先商文化探索和二里岗文化渊源。作者以为:1. 先商时期商人往返于豫东商丘和漳河型文化分布区,先商文化和漳河型文化是并存的文化。先商文化约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契、昭明时

期的先商文化,相土等居商时期的先商文化,上甲微居邶时期的先商文化,商汤居亳时期的先商文化。其中,契时期的先商文化是商丘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型,商汤时期的先商文化和二里岗下层早段接近。2. 二里岗文化是吸收二里头型文化因素、漳河型文化因素以及自身独具特色的因素组成,并非由二里头型文化或者漳河型文化发展而来。3. 豫东商丘和蒙泽附近的亳是探索先商文化的基地。东方之亳、管亳(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是商初商汤的“三亳”,东方之亳为宗邑。

目前的研究状况表明,先商历史地理与文化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有待于通过田野考古予以最终解决。作者希望本书关于先商历史地理与文化的研究,有助于以后的考古工作。

晋侯墓地 M64 资料在《中国文物报》发表后,作者认为铭文应当是“晋侯郟父”,撰写《释郟》,出于谨慎未予发表。十年后,作者研究西周青铜器涉及晋侯铜器。当此时,学者对于晋侯墓主人的发掘和研究相当深入,但是仍未能提出学者皆可以接受的方案。作者撰写《北赵晋侯墓地墓主考》提出新的观点,并相信大体可靠。

作者十余年前居于江汉,亲自参加了宜城郭家岗遗址的发掘,又参观了一些两周时期的遗址,搜集了一些楚文化资料。既至北京大学,邹衡先生问西周之楚,对曰:楚小,在南昌、江陵间。于是,邹衡先生命作者研究早期楚文化,历三年乃成。邹衡先生评论:“关于楚文化的分区以及楚文化的来源都提出了崭新的见解,使楚文化的研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学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事情,作者希望本书的成果有助于以后考古工作和史学研究。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夏代纪年、都邑与文化的探究:

关于夏代纪年研究。《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年四百七十一年是自大禹任夏伯之年始,而《世经》记载的夏年四百三十二年是自大禹即位之年算起。《世经》关于夏年四百三十二年的记载是正确的,它真实而清楚地记录了历史。探讨了夏文化和夏代纪年之间的对应关系,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末期文化和二里头一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二里头一期大体包括启、太康时期和后羿代夏时期,二里头二至四期文化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代中晚期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代中晚期都城。

关于早期夏文化问题。《国语·鲁语上》、《礼记·祭法》等记载的夏人祀典,夏人以大禹为开国之君,大禹时期不存在文化变迁的背景,后羿代夏也无考古学文化变革的实证。因此,文化的变革只能是发生在时代巨大变革的夏启之时,二里头文化始于夏启之时。二里头文化一期是夏启至少康中兴以前的文化,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属于少康中兴以后的文化。因此,早期夏文化应包括大禹所处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末期文化和夏启至少康中兴以前的二里头一期文化。

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性质。一些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作者分析了二里头遗址的内涵,指出相当于太康晚期、后羿代夏时期的二里头文化一期时,二里头遗址仅仅是普通村落,因此,二里头遗址不是太康和后羿的都城斟鄩。从时代与内涵分析,二里头遗址应为少康中兴以后夏代中晚期诸王的都邑。

二是对先商暨商代历史与文化的考察:

关于契至于成汤八迁。作者搜集汉代以来学者的考据,加以评述。结合文献和考古

资料,提出商、蕃、砥石、有易、上司马(邳西南)、亳、管为契至于成汤八迁之所。考证了以上地点的地望。探讨了《诗》、《书》中有关契至汤国家状况及其迁徙的文献记载。提出目前关于契至汤八迁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仅仅处于探索阶段,其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阚伯相土所居商丘考。传世文献关于商人居商(丘)的地望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记载:睢阳商丘、濮阳商丘、商洛之商和上谷之商。作者根据商人居商丘的文献记载,确定了判断阚伯、相土所居商丘的四项标准。运用这四项标准对各个商丘进行考察,发现濮阳商丘、商洛之商和上谷之商存在严重的文献问题,并且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也不是先商文化。而睢阳商丘文献记载翔实,并且具备先商文化形成的良好环境。另外,还对殷墟卜辞中的“商”、“商丘”等进行了考察。

商汤居亳考。商汤灭夏以前的亳在东方商丘附近,作者对亳具体地望进行考证。指出由于历经地理沿革,春秋宋国薄邑和商代的亳地当于汉晋蒙、薄二地求之。通过《左传》、《国语》对照,明确蒙、薄在春秋时期属于一地异名,春秋时期的薄在蒙泽附近。进一步分析了殷墟卜辞记载的亳也正在蒙泽附近。作者还探讨了商、亳的地理关系,证明二者是统一的,商为国名,亳是都城,商国内有商、亳二邑。汤有三亳,商初汤仍居东方之亳。

释“三亳”。通过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规模、重要遗存等方面的分析和比较,确定郑州商城为早商正都管邑、偃师商城为别都。通过对考古学文化分析同先商之亳相联系,以及依据殷墟卜辞和文献可靠记载,论证了东方之亳为先商时期汤所居亳,是宗邑。东方之亳为商帝业所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商汤灭夏以后建立的都城。

商周管邑地望考。传统观点认为管叔邑在郑州旧城一带,但是这种认识与考古发现存在矛盾之处。作者考证《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文献记载的管叔邑就是指郑州商城和郑州战国城,从而肯定文献记载有误。结合考古资料、古文字以及传世文献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管邑在郑州西北郊一带,商代晚期的管邑也应在郑州西北郊一带,郑州战国城是战国管邑,而郑州商城是早商时期的管邑。郑州战国城及其郑州西北郊不少地方出土带有“亳”字的战国陶文,可能是战国人认为郑州一带与商汤故都有关,既不能说明郑州在战国时期名为亳邑,也不能证明郑州商城是先商时期的亳,郑州商城是商汤灭夏以后建立的都城,称管亳,可以简称为亳。

关于漳河型文化。作者认为分布在豫东北冀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漳河型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并无直接的因袭关系,它并没有演变成为二里岗文化。冀南地区的漳河型文化是由冀南地区的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发展而来,冀南地区原本是姜姓共工氏所居之所,共工氏被灭后,其分族居之。冀南地区属于姬姓控制区,冀南地区臣服于颛顼、帝喾、尧、舜等的统治,该地区文化深受豫北地区文化的影响。豫北地区的漳河型文化则是冀南地区漳河型文化向南传播的结果,可以考证的夏代“豫北八国”分别是炎帝、颛顼、祝融、舜和大禹等后裔的封国。先商时期,契封于商,文化本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型,商人虽然曾经迁居于漳河型文化分布区内,但是并不足以作为依据判定漳河型文化就是先商文化,考古资料证实了豫北地区的漳河型文化发展为台西型商文化,与郑州二里岗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漳河型文化和先商文化是两种不同族属的文化。先商文化与漳河型文化之间是并存的两支性质不同的文化,先商文化主要是在先商早期受到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和漳河型文化的影响。

探索先商文化的途径与方法。先商时期商人主要在今商丘一带活动,虽然曾经迁徙至漳河型文化分布区,但是并不足以归结为漳河型文化就是先商文化,作者举例论证一些文化与迁徙地文化并非同一。探索先商文化必须辨明二里冈文化的渊源以及先商时期商和亳的地望,商丘地区对于探索先商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先商文化。作者将先商文化分为四个阶段进行探讨。先商文化本于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型,龙山末期,由于东夷人的侵占,商人被迫迁徙。契居蕃,昭明居砥石,商人迁居于漳河型文化分布区,吸收了一些漳河型文化因素,此时的先商文化以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型为主体,包含一部分漳河型文化因素,其中重要的是吸收了漳河型文化的陶鬲作为主要炊具。昭明南迁于商,相土等久居商丘,先商文化吸收了大量的二里头型文化因素,而排斥岳石文化因素,从而形成了二里头型文化与漳河型文化的融合,造就了先商文化与早商文化(二里冈文化)的特点。王亥、上甲微时商人又迁居漳河型文化分布区内,不过这时的先商文化已经十分稳定了,再吸收的漳河型文化因素很有限。报丙前后南迁商丘至汤居亳时,先商文化与二里冈文化相差不大,尤其是汤居亳时期的先商文化与二里冈文化之间只存在时代上的差别,而文化内涵大体相同。

关于二里岗文化的渊源。二里岗文化是由“二里头型文化因素”、“漳河型文化因素”、“二里岗文化独特的因素”整合为一体的。二里岗文化是先商文化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成汤灭夏前夕的先商文化和灭夏后的二里岗下层文化无大的差别。在逐一排除的基础上,作者指出二里岗文化的形成地域只能是在商丘地区,强调了在商丘地区探索先商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于先商暨商代历史与文化。比较简明地概括了先商历史地理与文化的大要。

三是对周代历史与文化的探讨:

北赵晋侯墓主考。作者分析了北赵晋侯墓地的晋侯和夫人墓,考证出 M93 为晋武公之墓, M64 为晋鄂侯郟父之墓,而 M114、M9、M6、M33、M91、M1、M8 七墓,分别为成侯、厉侯、靖侯、懿侯、献侯、穆侯、文侯之墓。晋侯墓地的布局以成侯墓(M114)为中心分南北两排,并且不见“死于兵者”晋侯的墓葬,与《周礼·春官宗伯·冢人》记载符合或近同。唐叔虞、晋侯燮和晋武侯的墓葬当在天马一曲村遗址范围之内。

关于鄂西地区西周和春秋时期楚文化。西周和春秋的楚文化是当今考古学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由于缺乏考古资料等原因,西周春秋楚文化成为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新发表的考古资料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作者利用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原理和方法,对襄樊真武山、宜城郭家岗遗址的西周和春秋的陶器作了仔细的分析,将鄂西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日常生活陶器划分为六期。对比鄂东和关中等地区的周代文化,推定各期年代。一至三期分别相当于西周早、中、晚期,四至六期分别相当于春秋早、中、晚期。通过对鄂西春秋楚墓出土铜器的形制和组合的比较,将鄂西地区春秋铜器分为四期。对比鄂东和中原等地区的周代文化,推定各期年代。一至四期分别相当于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早段、春秋中期晚段、春秋晚期。

鄂西地区西周和春秋文化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地区之间的文化替代等原因,显示出若干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的区域。根据这些特点,鄂西地区的西周和春秋文化可以分为三区:襄樊—江陵区、宜昌—奉节区、松滋—澧县区。通过文化

内涵分析、各区文化关系探讨以及联系文献,对各区文化进行定性。其中,襄樊—江陵区的西周春秋早期文化属于“荆楚文化”或“荆蛮文化”,春秋中晚期以后的文化属于楚文化;松滋—澧县区的商代和西周文化属于濮文化,至迟春秋中期为楚文化替代;宜昌—奉节区的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的文化可以称为“周代文化三峡类型(包括秭归地区的夔文化)”,春秋中晚期的文化属于楚文化的一个区域类型。

作者还认为,通过西周春秋时期楚文化和周文化在日常生活陶器、青铜礼乐器、卜甲卜骨以及墓葬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判断:西周春秋时期,楚文化深受周文化影响,楚文化吸收、改造了周文化的许多文化因素,同时又保持了不少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西周和春秋早期的楚文化和周文化是同源的关系,春秋中晚期二者同源异流。早期楚文化与周文化的不同主要缘于地域的不同。

对西周时期楚居所,作者的结论是:楚在西周之时为汉南之国,周平王之时楚人犹在彭水以南、江陵以北地区,南漳一带应为西周楚人始封地。

目 录

序 / (1)

第一部分 夏代纪年、都邑与文化 / (1)

夏代纪年考 / (1)

关于早期夏文化问题 / (21)

试论二里头遗址的性质 / (25)

第二部分 先商暨商代历史地理与文化 / (31)

契至汤八迁考 / (31)

阚伯相土所居商丘考 / (80)

商汤居亳考 / (95)

释“三亳” / (110)

商周管邑地望考略 / (130)

试论漳河型文化 / (140)

试论探索先商文化的途径与方法 / (167)

先商文化探索 / (176)

二里冈文化渊源刍议 / (185)

先商暨商代历史与文化十议 / (193)

第三部分 周代历史与文化 / (195)

北赵晋侯墓墓主考 / (195)

鄂西地区西周春秋楚文化探研 / (210)

附录 古文献(截至清代)征引目 / (291)

英文提要 / (301)

第一部分

夏代纪年、都邑与文化

夏代纪年考

引言

夏代纪年对于研究夏代历史与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古代文献有夏代纪年的记载,但是对于夏代积年和各王在位年数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是我们研究夏代纪年较为全面的成果,分为三个部分:一、夏代纪年的资料来源、体系及可靠性分析;二、夏代纪年索隐;三、夏文化与夏代纪年之间的对应关系。

一 关于夏代纪年的资料来源、体系及可靠性分析

关于夏代纪年资料主要有东周时期的史料、汉晋学者的整理资料、西晋初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以及宋代学者的整理资料等。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关于夏代纪年的数据主要有三个体系(表一)。

(一)儒家体系

儒家文献及其征引儒家观点的文献记载的关于夏代纪年的数据,皆以儒家体系之名统之。关于记载夏代纪年的儒家文献及其征引儒家观点的文献很多,《孟子》、《史记》、《易纬·稽览图》、《世经》(《汉书·律历志》引)、《帝王世纪》、《古今刀剑录》、《册府元龟》、《皇极经世书》、《资治通鉴外纪》、《编年通载》、《绍运图》、《皇王大纪》、《通志》、《资治通鉴前编》和《文献通考》等记载的数据,或较为原始,或有代表性,或成系统。因此,成

表一 夏代纪年的三个体系

	竹书纪年体系		儒家体系													路史体系	备注		
	古本竹书	今本竹书	孟子·尽心上	史记·夏本纪	易纬·稽览图	世经(汉书·律历志引)	帝王世纪(御览、初学记引)	古今刀剑录	册府元龟	皇极经世书	资治通鉴外纪	编年通载	绍运图(历代帝王绍运图)	皇王大纪	通志	资治通鉴前编	文献通考	路史·后纪十二、后纪十三	帝王本纪(外纪、路史注引)
总年	471	431			431	432	432		432	459	432	432	440	432	440	459	483		
禹	45	8	7	10		9		9	27	9	10	15	8	10	8	27	15		
启	39	16				9(10)	10	9	9	9	10	9	9	9	9	9	16		16
太康		4				29	29	29	29	29	29	29	29	29	29	29	19		
仲康		7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8		28
相(相安)	7+?	28						28	28	28	28	40	27	28	28	28	30		28
后羿		—						(40)	少	8	2		少	8	少	—	—		—
寒浞		40							康	32	10		康	32	康	41	43		40
少康		21						21	61	21	49	49	62	21	61	22	46		
杼(宁予)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27		
芬(槐)	44	44				26		26	26	26	26	16	26	26	26	26	26		
芒(荒和)	58	5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3	
泄(世洩)	21+?	25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26		16
不降(降)	69(19)	59						59	59	59	59	63	59	59	59	59	59		59
扃(禺)		18				21		21	21	21	21	21	22	21	21	21	21		21
廛(胤甲)		8				20		20	21	20	20	22	21	20	21	21	20		
孔甲		9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40		31
皋(昊)	3	3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发(敬)	1+?	7						11	19	13	10	10	19	13	19	19	12	11	
履癸(桀)		31						53	53	51	52	53	52	51	53	53	43		52

注:1.《今本竹书纪年》岁名“始壬子,终壬戌”合四百三十一年,包括各王在位年数和行丧年数,行丧时间四、三、二、一年或数月不等。

2.《编年通载》正文“夏代积年”和“夏桀之年”阙。章衡撰《进编年通载表》言:“夏有天下四百三十二年”,据以补入。

3.《资治通鉴外纪》于帝发陟位注:“《帝王本纪》十一年”。《路史·后纪十三》于帝发陟位注:“《帝王本纪》十三,《外纪》云十一。”《路史·后纪十三》于履癸(桀)陟位注:“《年代历》诸书五十二、五十三或云十二。”

为本文重点探讨的对象。至于唐代一行《日度议》(《新唐书·历志》引)、司马光《稽古录》等征引夏代纪年少量数据的文献也有不少,但是这些数据都见于时代较早的文献。

《孟子·万章上》有大禹在帝位七年崩,三年丧毕,而启即帝位的记载。《史记·夏本纪》有相同的记载,但是《史记》作大禹十年崩,三年丧毕。由于《史记》的记载是遵循《孟子》的,我们可以判断:大禹在帝位当作七年。“三年丧毕”是儒家的见解,《孟子》中多见,尧舜崩后都是行“三年丧毕”,《史记》也遵循此说。

汉代的《易纬·稽览图》和《世经》(《汉书·律历志》引)仅有夏年四百三十一年或四百三十二年的记载,缺少夏代各王在位年数。《帝王世纪》是三国和西晋初皇甫谧整理文献的成果,它继承了《世经》的体系,而且有夏代各王在位年数。《帝王世纪》实际上反映了汉代学者的认识,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帝王世纪》亡佚,学者作的辑佚本中的数据不全,不足以反映全貌。北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实际上是继承《帝王世纪》的(《资治通鉴外纪》不仅夏代积年从《帝王世纪》,而且《帝王世纪》辑佚本中保留的八个夏王在位年数,皆同于《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资治通鉴外纪》记载的夏代纪年数据可以视为《帝王世纪》的成果。南宋郑樵《通志》基本上采纳了《资治通鉴外纪》的观点。

《册府元龟》记载的夏代积年从《帝王世纪》,而且各王在位年数中同于《帝王世纪》辑佚本中保留的八个夏王在位年数。《册府元龟》与《资治通鉴外纪》关于帝发、履癸在位年数略有小的差异,并且《册府元龟》没有明确后羿、寒浞统治的存在。《册府元龟》关于商周纪年并不完全采用《帝王世纪》,其夏代纪年可靠程度应逊于《资治通鉴外纪》。

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记载的夏代纪年数据大体同于《帝王世纪》和《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但是个别不同于《帝王世纪》和《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皇极经世书》以大禹摄政之年作为夏代的开始,记载的夏年为四百五十九年。按:《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先后命皋陶、益摄政,皆不表示皋陶、益践天子之位。故《皇极经世书》以大禹摄政之年作为夏代的开始之说不可取。南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基本上从《皇极经世书》之说。

南宋初年成书的胡宏《皇王大纪》,除大禹之年采《吴越春秋》之说作八年外,其余大体亦从《皇极经世书》之说。南宋末年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采《吴越春秋》、《帝王世纪》、《资治通鉴外纪》和《皇极经世书》等文献的记载,编定夏年为四百四十年。《资治通鉴前编》记载的各王在位年数除了大禹的采《吴越春秋》八年说之外,其余皆同于《皇极经世书》的记载。

北宋章衡撰《编年通载》以夏年四百三十二年,与《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外纪》的差异主要是《编年通载》作后羿二年,寒浞十年、少康四十九年,分割了寒浞、少康在位的六十一年,又使少康十岁即帝位,违于《左传》的记载。

宋人诸葛深《绍运图》以夏年四百三十二年,而各王年代与他书有一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大禹之年作十五年,相在位作四十年,少康在位作四十九年,帝芬在位作十六年,帝不降在位作六十三年。按:《绍运图》关于以上诸王在位年数,不同于它书,并且不明所据。因此,《绍运图》的可靠性较低。

总之,关于夏代纪年数据的儒家体系,以《世经》(《汉书·律历志》引)、《帝王世纪》和《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为代表,而现存文献以《资治通鉴外纪》保存的数据最为全面。

《皇极经世书》等记载的夏代纪年数据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竹书纪年》体系

《古本竹书纪年》在西晋初出土时基本完好,《晋书·束皙传》有“夏年多殷”一语,《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年四百七十一年,而殷年四百九十六年,“夏年多殷”之语,必是来自对夏代各王在位年数的统计。这足以说明了《古本竹书纪年》出土时的完整性。《古本竹书纪年》至两宋之际亡佚,仅散见之于它书的征引,而后世学者尤视为珍惜。见于《真诰》、《太平御览》和《路史》等征引的《古本竹书纪年》多有分歧,学者也以意推之,难以确定,故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提出了许多疑问之处。南宋以后编辑的《今本竹书纪年》经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考证,绝大多数可以找到出处,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王国维也指出它的多数拼凑之处,并且总年与古本不合。然而,它毕竟是附属于《古本竹书纪年》的,一些数据与《古本竹书纪年》相同。

(三)《路史》体系

南宋罗泌《路史·后纪十二》和《路史·后纪十三》记载了夏代纪年,而罗莘的注释又征引了《古本竹书纪年》、《年代历》等文献记载的一些夏代纪年数据,这些数据多不同于《路史》,罗莘认为它们多为错误。其实,《路史·后纪十三》曰:“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岁。”按:《路史·后纪十二》记述夏史起自大禹,并曰“(禹)立一十有五岁”。罗莘注:“《纪年》禹立四十五年,宜赘四字。”而统计《路史》所记载的夏王在位的年数,自大禹即帝位至于夏桀之灭共四百九十岁,故《路史》之错误自见。《路史》记载夏代各王在位年数的数据,不仅仅有六个同于《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而且,对于《路史》注征引的《古本竹书纪年》的数据皆不采用。可见,《路史》记载的数据是区别于儒家体系和《竹书纪年》体系的一套体系。因此,《路史》的记载是不可信的,它是罗泌整理先秦史料的成果,但是在引文与考证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错误。

另外,《路史·后纪十二》和《路史·后纪十三》罗莘的注释又提到《帝王本纪》(按:《隋书·经籍志二》曰:“《帝王本纪》十卷来奥撰”)和《年代历》(按:《新唐书·艺文志二》曰:“贾钦文《古今年代历》一卷大中时人”)等文献记载夏代纪年的一些数据,但是,由于记载的数据不全,难以反映《帝王本纪》和《年代历》等记录夏代纪年的全貌。本文将之作为备注列于表一,以供参考。

总之,关于夏代纪年的数据主要有三个系统:儒家体系、《竹书纪年》体系和《路史》体系。其中,前两个体系价值大些,《路史》体系由于存在明显的错误,仅个别数据能够参考。儒家体系以《世经》、《帝王世纪》和《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为代表,我们认为《资治通鉴外纪》实际上源自《帝王世纪》,而《帝王世纪》又采纳了《世经》的体系。儒家体系本于上古传世之经典,而整理证明于汉晋之大儒,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一些数据与《资治通鉴外纪》、《帝王世纪》的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别,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西周年数仅二百五十七年的情况,可以证明《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存在错误之处^[1],可能缘于竹简残没或简文存在书写错误,也可能是出自不同的记载。学者以《古本竹书纪年》校正《史记·六国年表》尚有可靠之处,而夏、商、西周既远,

《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存在错误之处,因此,对于《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数据应当谨慎对待。

二 夏代纪年索隐

(一) 夏代积年数据

关于夏代积年,文献记载主要有五个数据:

1. 四百七十一年

《古本竹书纪年》(《太平御览》卷八十二皇王部引)曰: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史记·夏本纪》集解、《史记·夏本纪》索隐、《文选·六代论》注和《资治通鉴外纪》注等引《古本竹书纪年》,皆曰夏四百七十一年。

《路史·后纪十三》注:

《汲(冢)纪年》: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

按:《路史》及注征引文献数据多不准确,故当以四百七十一年为是。

2. 四百三十二年(或四百三十一年)

《世经》(《汉书·律历志》引)曰:

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

《初学记》卷九注:

皇甫谧云:自禹至桀,并数有穷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

唐代一行《日度议》(《新唐书·历志》引)、《册府元龟》、司马光《稽古录》、《资治通鉴外纪》、《绍运图》和《通志》等皆从四百三十二年之说。

《易纬·稽览图》曰:

禹四百三十一年。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岁名:

始壬子,终壬戌。

合四百三十一年。

3. 四百五十九年

《皇极经世书》卷三记载夏年为四百五十九年(岁名始丁巳,终乙未)。《皇极经世书》卷三记载大禹在帝位二十七年,以大禹摄政之年作为夏代的开始。

按:《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先后命皋陶、益摄政,皆不表示皋陶、益践天子之位。故《皇极经世书》以大禹摄政之年作为夏代的开始之说不可取。比较之下,帝廑在位年数,《皇极经世书》作二十一年,《帝王世纪》等作二十年;帝发在位年数,《皇极经世书》作十九年,《资治通鉴外纪》等作十三年;帝癸在位年数,《皇极经世书》作五十三年,《资治通鉴外纪》等作五十一年。其余各王在位年数的记载与《帝王世纪》、《资治通鉴外纪》等相同。《皇极经世书》与《帝王世纪》、《资治通鉴外纪》等不同的数据未知何据,而《皇极经世书》记载的夏代积年也与《帝王世纪》、《资治通鉴外纪》等不同。所以,《皇极经世书》夏年四百五十九年之说不足为据。

《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帝系考一》从《皇极经世书》之说,并曰:

夏一十七世,共四百五十九年,首丁巳,尽乙未。

4. 四百四十年

《皇王大纪》记载的夏王在位年数,始于大禹即帝位元年,止于成汤灭桀之年(《皇王大纪》卷五曰:“(桀)三十五载,成汤元年”、“成汤之始立于桀之三十五载矣”,成汤十八年灭夏,桀之五十二年),统计为四百四十年。

《资治通鉴前编》卷三记载的夏年,岁名始丙子,终乙未,计四百四十年。

5. 四百八十三年

《路史·后纪十三》曰:

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岁。

按:《路史》记述夏史起自大禹,并曰:

(禹)立一十有五岁。

罗苹注:

《纪年》禹立四十五年,宜赘四字。

而统计《路史》所记夏王在位年数,自启至夏桀共四百九十岁,故《路史》之错误自见。

关于夏代纪年,宋代以后的学者也有不少的研究,大体上遵从前人之说。关于夏代积年的五个数据中,四百七十一年和四百三十二年立说很早,而其余三个数据是后世学者围绕前两个数据探讨的成果,但是这三个数据的可靠程度差。因此,古今学者多研究《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四百七十一年和《世经》、《帝王世纪》和《资治通鉴外纪》记载的四百三十二年。

有些学者以为,四百七十一年包括了后羿、寒浞的在位年数,而四百三十二年不包括后羿、寒浞的在位年数。实际上,《帝王世纪》明确地说明四百三十二年包括了后羿、寒浞之年。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辑证》曰:

以岁名核之,则夏后氏始壬子,终壬戌,凡四百三十一年,而寒浞四十年亦在其中。考昔人所以定寒浞为四十年者,以古本《纪年》云“夏四百七十一年”。而《汉书·律历志》云“四百三十二岁”,《易纬·稽览图》“禹四百三十一年”,差四十年,遂以此四十年为无王之世以调停之。盖古言历者有此说,故《通鉴外纪》云羿八年,寒浞三十二年,共四十年,然《外纪》用《汉志》说,以夏为四百三十二年。此书用《稽览图》说,以夏为四百三十一年,而无王之年仍入此中。遂与古《纪年》四百七十一年之都数不能相应。

王国维发现了问题,但是未予解决。

(二)大禹至于寒浞在位年数分析

下面,对于大禹至于寒浞时期各王在帝位年数进行考察。

1. 大禹

大禹在位年数,文献有四十五年、二十七年、十五年、十年、九年、八年和七年等不同的记载。

(1)四十五年

《古本竹书纪年》(《太平御览》卷八十二皇王部引)曰:

禹立四十五年。

(2)二十七年

《皇极经世书》记载大禹在帝位二十七年,以大禹摄政之年作为夏代的开始。《文献通考》从。

按:《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先后命皋陶、益摄政,皆不表示皋陶、益践天子之位。因此,《皇极经世书》以大禹摄政之年作为夏代的开始之说不可取,大禹在帝位二十七年之说不成立。

(3)十五年

《绍运图》:夏禹在帝位十五年。

按:其说未知所据。推为《古本竹书纪年》大禹在位四十五年讹为十五年者。

《路史·后纪十二》曰:

(禹)立一十有五岁。

罗苹注:

《纪年》禹立四十五年,宜赘四字。

按:《路史》之说讹误,不可据。

(4)八年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皇王大纪》、《资治通鉴前编》和《今本竹书纪年》作八年。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曰:

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

其后,大禹崩于会稽。

(5)十年、九年和七年

《孟子·万章上》曰:

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

《史记·夏本纪》曰:

帝禹……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

《水经·浙江水注》、《古今刀剑录》、《皇极经世书》、《编年通载》和《通志》等皆从《史记》作十年。

按:《史记》文从《孟子》,“七”、“十”形近易讹,是《史记》之“十年”当作“七年”。

《帝王世纪》(《初学记》卷九引)曰:

(禹)七十四,舜始荐之于天,荐后十二年,舜老,始使禹代摄,行天子事五年。舜崩,禹除舜丧,明年始即真,……(禹)年百岁崩于会稽。

比较《孟子》和《帝王世纪》记载大禹在帝位年数的差别,实际上源于“三年丧毕”的有无,《孟子》用“三年丧毕”,其后,《史记》也用“三年丧毕”之说,《通志》从。《帝王世纪》于大禹崩后不用“三年丧毕”,而帝尧崩后却用“三年丧毕”。

《帝王世纪》(《太平御览》卷八十一皇王部引)曰:

尧崩，三年丧毕，……(舜)始即真。

按：《帝王世纪》关于尧、舜、禹的事迹同于《孟子》和《史记》，并且《帝王世纪》也存“三年丧毕”。因此，儒家体系的文献记载大禹在帝位年数当从《孟子》。

大禹在位年数，《孟子》的记载与《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相差三十八年。大禹在位究竟是四十五年，还是七年？何以有如此大的悬殊？我们认为，这主要是计算方法的不同，大禹在位四十五年，应是自大禹受封于夏、任夏伯算起，前三十八年包括治水成功后被封为夏伯任国君十八年（据《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舜年五十摄行天子之事，殪鯀举禹治水，十三载治水成功，舜百岁而崩。以事理推之，禹于舜年五十后治水，十三年载治水成功，是禹受封于夏任国君至于舜而崩后“三年丧毕”之岁容有三十八年，可知，禹受封于夏任国君十八年可信。《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条下班固注：“夏禹国”。按：《汉书·地理志》于侯国皆曰国，“夏禹国”当指禹为夏伯之都。《帝王世纪》（《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州郡部引）：“禹受封为夏伯，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在今河南省禹州市）、被帝舜“荐后于天”及摄政共十七年、舜崩后行丧三年、大禹在帝位七年，共计四十五年。类似的情况也见之于周代诸侯的纪年，晋武公以曲沃代晋，代晋以前为曲沃大夫已经在位三十八年，代晋以后受周室承认，纪年则称晋武公三十八年，是将为大夫的三十八年与为晋公的年代联在一起计算。

所以，《史记·晋世家》曰：

晋侯(缙)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缙，灭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号曰晋武公。晋武公始都晋国，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

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

(晋侯缙)二十八年，曲沃武公灭晋侯缙，以宝献周，周命武公为晋君，并其地。晋武公称并晋，已立三十八年，不更元，因其元年。

次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

(晋武公)三十九年，武公卒。

晋武公在位三十九年，为晋大夫三十八年，为晋君二年。

《古本竹书纪年》（《水经·河水注》引）有晋武公纪年：

元年，尚一军。……八年，周师、虢师围魏，取芮伯万而东之。

是晋武公既为晋君，史官以其元年纪年。

《汉书·高帝纪》曰：

……(高祖五年)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

不改元，“因其元年”，自称汉王之年算起。总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大禹在位四十五年，包括了大禹即帝位前任夏伯和摄政年数及其在帝位年数。史官计大禹在位四十五年，并非大禹在帝位四十五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大禹在位年数的统计是采取“因其元年”的方法。按：大禹于三十八年即帝位，四十五年崩，在帝位八年。大禹在帝位的年数，《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皇王大纪》、《资治通鉴前编》和《今本竹书纪年》皆作八年。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曰：